

“事件团结”: 新媒介与新乡贤共同体

——基于三起乡村事件的实证分析

○ 方旭东

(信阳师范学院 法学与社会学学院, 河南 信阳 464000)

〔摘要〕“共同体”在当今乡村遭遇“空心化”危机中并没有消退, 相反, 村落共同体与宗族共同体在具体事件开展中有一定的强化。乡贤精神在当代社会中并没有衰落, 家族化、等级化、个别化的乡贤逐渐呈现出村落化、民主化、平民化、群体性特点——新乡贤共同体形成。乡村建设应该注重于务实原则, 充分发挥乡村共同体的自主性, 更容易获得村民的广泛参与热情。尊重乡村主体自觉而非代理乡村, 这是乡村建设之本。

〔关键词〕事件团结; 新媒介; 新乡贤共同体; 村落共同体; 乡村建设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7.11.008

一、问题意识

学术界对乡村的看法主要有两种话语系统, 其一是共同体, 其二是社会。作为两种不同生活理念构型, 学术界几乎一致地认为中国的乡村是一个从共同体到社会变迁的过程。承袭滕尼斯有关“共同体”的分析, 20 世纪 30、40 年代, 日本的平野义太郎、清野盛光认为中国农村在相对稳定的地缘、农耕互助、宗亲关系中, 以寺庙祭祀为中心形成“乡土共同体”; 戒能通孝、福武直认为阶层、宗族等因素限制了村落集体性的形成, 仅仅只是在必要时的生活互助中存在“生活共同体”。^{〔1〕}二者论战的趋同性在于都认为乡村具有共同体性, 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侧重于乡村横向联合分析, 后者着眼于纵向等级化阶层与血缘排斥。最终问题集中于村落还是家族理应成为乡村分析单位。持前一观点的有费孝通, “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2〕}持后一观点的有弗里德曼, “几个紧密相连的村落构成

乡村社会的基本单位”。^[3]继“村落派”“宗族派”论争,尚有“集市派”。美国学者施坚雅提出“市场共同体”理论,认为乡村社会以集镇为中心串联周边村落而成。^[4]杨庆堃、杨懋春等人均持类似观点。

从上世纪 20、30 年代“乡村衰落”论调逐渐出现,近 20 年来迎来“乡村空心化”,乡村成了“半熟人社会”^[5]、“无主体的熟人社会”^[6]。中国乡村变迁似乎验证了社会变迁理论的一个观点,“从农业社会向现代产业社会转型中,地域社会最基本的变动是在农业社会形成的共同体的解体。”^[7]接下来的问题:“共同体解体”对应着以上哪一种共同体类型?遭遇现代性侵蚀的共同体有没有维护自身的抗争?传统村落社会具有高度的自治性与自主性,乡绅、家族长老是村落社会的精神领袖,如果从传统到现代社会转型是一个“共同体瓦解”的过程,那么村落社会精神必然也是一个从沉默到消失的过程。真的是这样吗?

另外,农民进城务工是一个需要积极适应现代高科技通讯技术的过程。历时 30 多年的当代农民工历史,也是一个农民通过进城获得城市视界的过程。他们是城乡关系调整的实际遭遇者,对城市与乡村的观察由被动进入、适应城市到反思性理解城乡的过程。如今农民工几乎人手一部手机,不乏有人具备在手机屏幕上用手指“比划”的能力。新媒体与村落社会“有识之士”的结合,是否生成了新的交流场域与实践动员?在“回不去的乡村”与“留不下的城市”之间,比起立足于城市,农民工的前途更有可能还是回乡。“不忘初心”的乡民,面对学术中的“乡村衰败”,他们是如何回应来“保卫家乡”的?

本文拟从“制度—生活”^[8]的分析范式出发,以皖西南 Z 村修路灯、救助生病村民、修缮祖堂为例,试指出进城务工者与在家村民之间是如何通过新媒体的信息互动来开展保卫乡村的实践。

二、地方概况与事件导入

(一) Z 村基本概况

Z 村是皖西南大别山腹地一高山自然村落。Z 村如今有 52 户,户籍人口有 205 人,常年在外务工的有 120 人。Z 村外出人口以进城从事油漆工、木工、装潢工为主。外出务工人员集中在北京从事印刷业务者有 10 人左右,他们是 Z 村经济能力相对宽裕的群体,其中已有两位在北京购房。他们的生意是从跑业务开始,该群体处事思路清晰,具有很好的沟通与交际能力。尚有打工地主要在县城,来往于乡村与县城之间的村民。留守中青年妇女进城给孩子陪读,只有假期才回家。加上在校生,在家常住人口不足 20 人。这 20 人平均年龄在 65 岁左右,其中一位是人称三哥的退休中学校长,他是 Z 村唯一长住非农人口。三哥是 Z 村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深谙农村世事,社会关系网络广,成为村落与家族事务共同的精神领袖。还有一位有着近乎 30 年打工经历、入赘 Z 村的返乡村民胡木匠,也长住在家。二者见多识广,且有一定文化水平;性格开朗,喜善乐施。Z 村至今只有 3 户没有在乡盖楼房,尚有 11 户已经在外地、主要是在县城购买

楼房。无论是在宅基地盖房还是在城里买房,几乎每户都有外债。Z村有5户芮姓,一户汪姓,其他的都是方姓。小众姓氏家户与同村方姓都有亲戚关系,共享同一集居村落,比邻而居。邻近家户空间设置相对稳定性加上宗亲关系,确保了该自然村落的社会关系总体上向来和谐。

(二)基层民主几无作为

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终结,生产队组织的村落治理失去了政治正当性,村落内部事务治理遂出现了某种“真空”。自1982年基层民主制度建立以来,类似于阎海军指出的,在1982年至2003年,村“两委”班子最大的公事就是帮助乡政府催讨公粮和收集摊派款以及抓计划生育。^[9]2005年国家提出“新农村建设”以来,村子里多了一个砖混结构的垃圾房,其它村落社会治理及公共建设几无作为。垃圾房里堆满垃圾,不时散发出恶臭味,年尾才会被村委会组织清理。“农村组织结构软弱、涣散”,^[10]“乡村以其自身的运作逻辑而保持了社会体系运作的有序化”。^[11]村落内部的公益事务,主要靠非制度式“村民自治”逐步推进。

2014年,Z村一公路段洪水漫堤,路基石坝垮塌。该公路是Z村农户上林山必经之地,也是行政村集体林场竹木运输必经之地,被认定为村级公路。公路垮塌后不久,村民组长告知村委会,村委会成员随后实地查看,告知该路段修复可以由“公家”出维修款,只是“现在没有钱”。村委会给出的意见是由Z村村民先自己筹款修复,核实后向上汇报,再经村里返回维修款。日常生活所需,不能等到村委会出了钱才修路。以Z村红旗组、新屋组两小组组长牵头,三哥、胡木匠等在乡者介入,根据村里大部分人的意见,预支春节戏灯^[12]积累的盈余彩头款修复路坝。戏灯彩头款由三哥以“灯会”名义保管。2013年春节戏灯盈余2.1万彩头款,修复路坝共计花费1.5万元左右。随后村民组长拍摄好修复图片、保存好有关票据,屡次与村委会联系,催要修路款。村委会给出的回答如初:现在没钱,再等等看。至今该款项依然没有着落。

(三)村民学会使用自媒体

Z村有一个村落为单位的QQ群,这一网络社交平台于2015年逐渐被微信群替代。QQ群于2009年由在北京从事印刷业务的一位村民创建,凡是会上网使用QQ的Z村人,不断被“拉进来”。群里成员主要是进城Z村人,涉及职业包括打工者、“老板”、学生、公务员、教师等。不在同一地理空间和同一行业,村民却共享同一身份认同,包括语言、生活习惯与经验。晚饭后、周末,群里互动异常活跃。QQ群成了一个非实体、虚拟的Z村。在家生活的Z村人不清楚外面人的生活状况,通过群聊就可能很快获得。相反,城里的Z村人也可能通过群里信息共享及时获得家乡情况。群里不时会出现搭顺风车求携带的信息。甚至,村里某一件事在家老人还不太清楚,城里的Z村人第一时间就可能知道,再通过电话告诉在家寡居老人。如2014年村里一位老人深夜去世,其亲属第一时间在群里公布了消息。差不多同时,在家老人经由在外地子女电话告知才获悉。在家者和集中在群里、分散在不同城市的同乡人,就某一事件开展差不多会同步

进行。再以以上这位去世长者丧事为例，在家者为其料理后事时，借助文字、图片、视频等信息，群里同步弥漫着哀伤气息。

群里、线上线下信息互通有无，配合无厘头的八卦、兄弟辈的荤段子，无形中让这些天南海北的村民随时体验着“在家”“在一起”的感觉。借助互联网平台搭建起的新媒体，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村落共同体精神在新时代形成聚合效应。

三、“亮灯工程”叙事

（一）“亮灯工程”缘起

2014年10月初，经常往来于Z村与县城间的一位装潢工村民在QQ群里发布一条消息：据说近期村里的公路由村委会牵头会铺上水泥，可能“上面”有专项拨款。这一消息很快在群里炸开，随后大家跟帖对这一喜讯表示振奋。一个月后，另一位村民在群里发出一条消息：据村书记说，“上面”款项还没有到位，修路具体实施时间尚不能确定。依然激荡在前一条好消息中的热情很快逆转。“我们村其它地方水泥路都已经铺上，凭什么”“是不是村委又想截留这笔款项”等各种质疑声音不断。大家很快形成一致意见：分头轮流打电话给村委会成员，一定要将此事弄明白！在后续两天时间里，群里有人说“我打过了”“电话占线”“电话打不通了”之类的话语。再过两天之后，群里信息反转：村书记带领一帮人下来“视察”，吃了一顿饭后，（村书记）叫我们尽快将路边的杂草清理干净……这意味着铺路的事情有望并在即。随后几天，群里很快贴出了几位在家村民清理路边杂草的图片。半个月后，退休在家的三哥不时在群里贴出水泥路铺设进程图片。群里喜庆的话语和搞怪的图片，传递出一种欢快的气息。

随后两天，装路灯的话语开始在群里出现。后来得知，在北京聚集从事印刷业务的Z村人有机会经常见面，聊及“回老家发展”事项时，一致性认为“要想富，先修路”。承接有关村子里可能会铺设水泥路的消息，聊天中有人无意间提到要是同时能装上路灯就好了。“夏天晚上，吃完饭沿着村子里的公路散步”“老人、孩子在家心理上更安全点”……类似话语随即激发了在场者的兴趣，开始认真协议此事的可行性。首先，否定了找村委会要到钱的可能性，初步确定私筹方案。接着，确定筹款方式，充分发挥差序格局作用，通过私人关系推动人带人的筹款。大家各自在自己亲属社会关系角度权衡，认为由他们发动可以筹到2万元钱，而且预算估计也认为只需要2万花费。他们将这一设想在QQ群里发布。第一天没有什么回应。第二天，三哥在群里回应：装路灯起码需要2万5到3万块钱，且认为准确花费需要问专业人事。被视为新乡贤的三哥的回应，很快获得了积极响应，有人私下咨询其熟悉的安装路灯技工，被告知需要花费3万元左右。初步估计与技术估计之间缺口不大是此事推进的基础。

（二）筹款

接下来就是筹款问题。有人认为按户或者按个人摊派筹款难以实行，也不合理，建议力争积极响应者私人力量带动其他人出钱。另一思路是以户为单位，

凡是希望自家门口大路上有路灯者应收最低限额的钱。最终方案是不强求摊派,充分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筹钱,同时希望三哥以及两位村民组长带头组织此项工作。QQ群里的鼓动性话语激活了大家的积极性,纷纷表示同意出款。三哥在家按户通知装路灯事宜,电话联系那些未进群的务工者和群里的不活跃者。筹款事项推进得比预料的快。

返乡常住在家的胡木匠率先在群里表态:愿意出1500元装路灯。随后那些在外创业相对成功者在群里跟进,1000元、800元、500元不等。表态只是意向,依然没有实质性行动。大家在群里观望几天后,发现“雷声大雨点小”。胡木匠再次在群里告知,其已经将钱打到三哥的银行卡上。这一示范作用促发了筹款转机。随后几天三哥的银行卡中不时有进账。结果,即使被视为困难户、钉子户,甚至不在拟装路灯路边的住户也出钱。最少的出了200元钱。最终共计收到28929元钱,实际花费25000元。

(三)进入在地实践环节

依照群里群策提供的有效信息,由三哥牵头带动在土热心公益者,一起勘定施工路线,绘制路线方案在群里发布,公开讨论,结合外出者与在乡者意见,修订方案后最终形成意见。三哥联系上装修工,现场勘察、议价,确定施工时间。就此事对三哥进行访谈得知他在家做了许多工作,但他认为辛苦并不重要,“公益的事情只要弄起来都是好事”。关键是“做人的工作”,大家一致认为三哥受了不少委屈。为了节约经费,三哥请村民挖埋灯杆的洞,声明一孔洞可能只给一包烟的钱(约10元钱),遭到一人拒绝。另外一劳力主动申明每孔洞没有20元钱不会出工。有住户要求就近安装路灯、多装灯头等细致要求不能实现而不满,这些都需要三哥耐心地协商、调整和说服。当然也不乏自觉村民,协助施工人员,主动带上工具拔草、清沟、挖洞。

(四)在家老人、妇女提供后勤保证

考虑到经费因素,施工时没有明确给出工村民免费管饭。安装路灯基本上以村里主干道为主兼顾就近住户原则安装,在家老人、妇女为工程后勤起了关键作用。在自家门口装路灯,主要受惠者正是该户人家,岂有不送茶水、管饭之理?而且都是乡里乡情的“自家人”,“随菜便饭”是应当的。老人、妇女怀着如此心态,义务解决了装修路灯人员的伙食问题。即使“随菜便饭”,按照当地民俗,也是有酒水的,一桌花费一般也需要150元左右,供应饭菜家户为装路灯节省了开支。供应饭菜家户人手少忙不过来时,一般会叫上乡邻妇女来帮忙,边聊天边烧饭。村里红白喜事、公益事业,基本上都是如此互帮互惠模式开展。用她们的话说,“吃不了多少,图个热闹”。这一“图热闹”心态正好与热衷公益事业的基本精神一致:参与、互惠、喜庆;在积极的人与人、人与事的连接中获得自我价值实现和社会认同。

被村民冠名为“亮灯工程”的工事持续一个月。真正完工亮灯的下午,QQ群里上传了村里放炮竹庆贺的图片,夜晚又有“好事者”到处拍摄灯光下的乡村

图景传到群里……夜归者老远就发现村子里有灯光照亮回家的方向，一致认为集体做对了一件事情。如今每年夏天，微信群里，不时会看到从Z村传来的照片：老人在路灯下散步；三五个人坐在路灯下摇着蒲扇聊天。

四、“亮灯工程”后续效应

（一）救助小年

Z村修路灯的成功实践，逐渐成为村子里公共活动开展的一个模式，在对患病村民小年的救助中也体现了这一模式。小年是Z村方姓村民，初中毕业后常年在从事油漆活，2017年年初被查出肝部有肿瘤，5月份医生告知必须动手术切除，医院挂号有效期限定三天。手术费用至少需要2万，小年只有5000元左右存款。依照“亮灯工程”率先在自媒体中发起的经验，同村知情者在微信群里告知大家小年的病情，并发出捐款倡议。接着，三哥等人在群里以讨论方式推进付款、转账方式，并强调“情况危急，人命关天”。接下来，小年的血亲及私交亲密者率先响应，微信群里逐渐出现出自他们转账成功的网络标识。随后，身在天南海北的Z村人短时间内尽快跟进转账，消息发布当晚将筹款推向高潮。短短两天内通过微信群筹到近乎2万元捐款，捐款者主要是Z村村民。线下有关人员综合微信群里的商谈意见，积极促成住院动手术，且随时发布手术进展情况……不幸的是，小年于今年8月份在家病故。

在小年去世的随礼中，微信群里出现了一个细节：无法回乡参加丧礼的Z村成员，有人有意识在随礼时指明由小年遗孀收款。村民希望通过如此方式，暗示随礼款项完全应该由小年遗孀支配，以确保小年的两个孩子获得急需的经济保证。无论是小年遗孀今后终生守寡地成为“方家媳妇”，还是其可能带着孩子改嫁，都需要花钱。指定收款人——如此细微的要求，兼顾共同体大局与个人情感，微妙地将超越私人化家族利益优先考量嵌入现代村落共同体意识中，“推己及人”，对个人给予充分的尊重。

（二）修祖堂

Z村的方家老屋在2014年的一场暴雨中坍塌，破败的老屋让Z村方姓家族成员有着深深的遗憾。敞亮的“老屋”象征着一个家族的兴旺与历史绵延。每年，回家过春节的Z村人不止一次提出修复老屋的构想，最终都因为“花钱太多”而搁置。

以“家”的情怀与名义，60多岁的绪全老人在微信群里发起有关修缮老屋的事情。绪全老人年轻时通过招工方式进入安庆石化厂工作，中年时要求调到与Z村不远的天柱山管委会。两个女儿高中毕业后也在天柱山从事旅游管理业。计划生育中超生的小儿子，在县城、深圳等地创业。该村民工作地与家不远，自觉长期来往于老家的社交关系中。家族里的红白喜事，他基本都能亲临。他是一个对“家”有着深厚感情的人。退休后开始赋闲，抑或思乡情更切。2016年秋季，绪全老人三番五次返乡与三哥等人商谈重建老屋事宜，还带来古建筑师现场

勘察。他的构想中,修建好的老屋应该是很气派的砖木结构仿古建筑。他的宏大构想,从群里的追随者来看,并没有充分调动人们的参与热忱。

2017年6月9日清晨,群里一篇“修建方家老屋祖堂倡议书”被贴出,同日上午该倡议书在群里“炸开”。倡议书出自一位“90后”方姓女孩之手。她是胡木匠的三女,自称“方家三少爷”。她的童年在方家老屋中度过。“方家三少爷”高中毕业后,在海南一地图勘测公司工作。她充满溢美之词的倡议书,情真意切,勾起了大家深深的共鸣。

该倡议书一出现,认真跟帖的第一人是绪全老人,接着是三哥。无外乎是方氏后继有人、强烈支持等话语。随后三哥提出倡议书中用“祖堂”替代“老屋”的用语值得肯定;并且郑重地提出修复老屋意见:族中几位最近多次与我谈及重修老屋祖堂之事,我考虑,现在确实应该启动了!这样吧,先成立一个负责事务的机构,叫做理事小组,6、7人组成。大家推荐,最好没有出远门、平时在本县内的。这个事情就在今天进行。随后,“方家老屋”字眼在群里逐渐消失,更容易引起家族共鸣感的“祖堂”频繁出现。

胡木匠跟帖:建老屋祖堂方绪旺(三哥)为总负责人,组员包括方绪全、方诒善、方小留、方小生等几位理事会主要成员。次日,Z村方家祖堂修缮小组专属微信群开通。

经过群里三番五次讨论,最终共计有七位理事会成员。这七位成员组成的理事会有如下特点:1.年龄上涉及到老、中、青;2.以常年活动范围在土、在乡者为主;3.具有较强家族意识、恋乡情怀;4.在村子里有众人缘,善于社交;5.经济能力在村子里处于中等偏上水平;6.以家户坐落空间为准,全部覆盖Z村方姓不同聚居点,有利于带动邻居积极性;7.七人分别属于方姓家族内部两个房系,便于从血缘上化解不同房系之间的矛盾。

接下来就是筹款。按照自愿原则,群里陆陆续续出现喜庆的“发红包”场景。在随后两周内,收到6万元左右的筹款承诺。一旦承诺被公开,接下来就需要兑现,否则“没面子”。到10月28日,共收到38人捐款58800元,以此基数计算,Z村方氏家族成员平均每人捐款1500多元。捐款者最多的是5000元,最少的是200元。包括父辈就不生活在Z村的邻县方姓同宗后裔,也自发捐款。修建祖堂需要扩展到老屋先前户方江山家宅基地,他无偿贡献出。

2017年6月10日,重建方家祖堂实施方案(草案)在微信群里出现。修建场景的图片随时可能出现在群里。

9月8日,祖堂修缮工程正式奠基。

三哥在群里发出如此字样:(农历)七月十八,黄道吉日,晴空万里,艳阳高照。九点十八分,第一块祥砖登位!预示明裕公全体后裔吉祥康泰,兴旺发达!随后群里一片欢腾,放鞭炮的动态图片被反复地贴出。

10月22日,群里有人告知,祖堂于前天基本竣工。接下来的事情就是等到腊月更多村民返乡,一起见证按照乡村礼俗盖房上梁的神圣时刻。

五、Z村乡村建设与社会救助的启示

(一)民主又不乏道德压力的议事机制

QQ群、微信群等互联网及时有效的传播机制和互动平台促成良好的民主议事氛围。闲聊式介入,互联网中的“群”已经逐渐取代了乡村传统的现场议事方式,且具有优越性。如此议事,避免了同一时空身体直接参与议事带来的对抗升级、情绪扩散,避免了矛盾扩大、内部分裂,体现出一种现代民主协商的议事原则。“群”里的意见、异见无法情绪化绵延,只能是在简练的文字、图片、语音中沟通。视频群聊需要时间同步,容易导致网络瘫痪及流量过度耗费,对于村民而言不是一个理想的议事方式。另外,群里议事多元的表达方式让娱乐伴随议事本身,这是一个缓解紧张气氛的过程。不同的诙谐网络图标、不时有人出现一句插科打诨的话语等,即使在最紧张的讨论中也不乏一种喜感伴随其中。

互联网议事保证身体在物理空间上相对轻松、私密的状态中展开。群里的谈话,确保谈话者有着足够的人身自由,回避了语气、语调、眼神的彼此刺激,可以随时保持沉默和不参与行动,其他人参与讨论可能仍然在继续,且可以随时跟踪查看。通过对群里议事动态的观察,当一位发言者的意见遭到众多质疑或反对时,发言者往往会在群里暂时主动禁声。没有发言不意味着他没有关注其他人的表达,暂时无发言者可能依然“潜伏”于群,关注着群里事态进展,这使讨论者和没有讨论者之间关联,获得独立理性思考的时空保证,有利于个人积极权宜且及时调整自身与事态相关性。这有助于个人与事件的关联且得到理性评估,并且会在其他谈话者对事件的理解中获得启示。个体自主性和团体协作机制之间达成足够的尊重和权力保护。

个人对共同体忠诚和维护的归属感中,群里的商谈伦理具有自主性和共同体精神的一致性状态,自由与民主表现得充分,将有关自治的观念在结构和理念上都达到了良性循环。相较于同时身体在场的议事,团体或者个人权力、权威对个人的压迫感大大降低,激活和充分调动了人的自主性。

当公共事务讨论涉及到表态、捐款时,在群里选择沉默可能是最令人失望的态度。表达出自身不支持、不参与的意見比持久地沉默更值得人尊重。群里也许没有人对沉默者反对,沉默在群里却生成了一种逃避、躲着的不光彩形象。如此形象与其他支持者的热议形成强烈反差,无形中给沉默者制造出道德压力。群里表面上松散、欢快的议事空间,一旦议事主题确定,虚拟空间同样会制造出一种紧张感。每个群成员都在“观看”他人,同时自身也一直在被他人“观看”。作为一种消极、逃避的沉默形象,也许会在如此逼仄的紧张感中最终违背本愿表达出从众的意见——这正是事件支持者们希望看到的效果。另外,筹款事项中,每一笔到账,收款人都会及时在群里公布,“又一喜报,某某捐款多少钱,已经到账”。随后群里会有人以各种喜庆图片跟进赞赏,包括鼓掌、鲜花、放鞭炮等。捐款者在如此氛围中获得了道德上的愉悦感,同时对沉默者、承诺却尚未兑现款项

者构成心理压力。只要在群里,每个人对具体事项的心态、行动显得格外透明,不再有含糊、不为人知的机会。鼎力支持者、沉默者、反对者可能生成线下闲聊的新话题,实现从议事到议人的舆论转换。对待村里公益事业的态度,会形成村民对其下一波舆论评价的依据。

群里的见解和创意,无论是心血来潮还是重大方案设想,围绕乡建主题,类似话头往往从一个近乎乌托邦式的设想起步。话头抛出本身未必具有多大的严肃性,与在群里抢红包和发一些奇闻异事一样,都可视为是漫无边际的娱乐。如此散淡的话头一旦涉及到村落事务,可能内嵌着同一地方不同人的自主性危机意识:“我希望在未来过什么样的生活?”一旦群里有人接过话头接着说,私人化的话题可能就会被推进成一起公共事件被热议。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想象力到实践,由此可能被激活。

(二)务实的乡建有效激活村民的参与热情

老人和家庭妇女乐意参与乡村建设,托付起诸如茶水、“管饭”事务,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通过在自家吃饭,暂时实现了孤独个体和群体的连接,老人获得了心灵上的安顿感。参与过程可能是一个劳累的过程,也是一个欢快的过程。他们认为“闲着也是闲着”。这是老人被留守后能够提供的最可贵的劳动资源。其二,从乡村建设事务本身出发,能够获得老人的理解和支持,认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主观上愿意力所能及地参与其中。让老人获得福利理应是乡建价值需要兼顾的一个因素。直接在安装路灯中受惠的主要群体正是这些长期在家的老人。安装路灯这一亮化工程,表面上看是村落现代化的表现之一,实施结果确实能够惠及民生,从而获得村民一致性肯定。类似实用的建设比起新农村建设中由政府推动的游乐园式体育设施入村,更容易获得村民的肯定与自觉支持。据笔者在江浙发达地区山村的调研,那些城市社区里常见的健身器材在此往往处于闲置状态,地上遍布藤蔓、杂草,新投入的器材得不到护理,已有锈斑。对于那些欠发达的中西部偏远村落,在乡农民常年都在经营生产性劳动,压根无暇无心体验类市民趣味的健身活动。2015年潜山县一留守儿童被杀,^[13]传闻杀人犯逃到深山老林,而且邻村有妇女在黄昏时看到山上有陌生人影,这让在家老人与进城子女高度恐惧不安。装上路灯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这种心理压力。由这一传闻事件出发,村里的年轻人已经有了在关键路口装上摄像头的构想。按需所设的乡村建设更容易获得村民的支持,在此类建设中他们更容易体验到拥有被尊重的主体性。

(三)有选择地吸纳合理现代性的乡建观初步形成

“亮灯工程”说明现代化作为一种环环相扣的系统化、技术化生活方式,逐渐获得村民承认。人们愿意充分吸收城市文明与高科技中合理、积极的成分,移植到乡村文明内部适当地对乡村进行改造。深受传统性和现代性影响的乡村,有意识寻求乡村与城市之间积极有效的平衡,在村落社会内部尝试体验城乡结合。村落社会生活曾经只注重于家庭事务的投入,逐渐转变成希望获得更大范围内

的公共事务建设。“巢居”于家户单位的乡村不但希望生活在基于血缘、地缘的感性秩序中,而且也希望有组织地生活在具有高度公共性的社会中。如何应对现代性消极因素对乡村的冲击,又有效地将现代性合理成分融入乡村生活,如此维度正在成为乡村有识之士积极思考的方向。松散的地方性乡民团体中正孕育着组织化的集体性诉求。遭遇转型巨变的村民逐渐意识到,“家”中不能只有独立的家户利益,而且需要借助理性的组织行为培育起具有公共色彩的“家园”意识。通过在地方性情感结构发生作用的“家园”中安放“家”,再安放自身,这正是村民自主从事乡建有意谋求的方向。有一个可以与此相互应证的细节。2015年夏季微信群里不时传出返乡村民在河里抓鱼的照片。有人提议用渔网会收获更多,回应者说不妨一试。村子里的小水潭,如果真的用渔网捕鱼,完全能够实现一网打尽。随后群里出现了三哥的文字,他说钓鱼可以,不允许用渔网。道理自明。随后同意三哥的跟帖增多。至今村子里尚无用渔网网鱼的事例。村子里的水资源相对丰富,一旦到了干旱的夏季人用水资源依然紧张,冬季返乡者增多,用水量也增大。户外水池洗用后,在家老人们并没有养成及时关紧水龙头的习惯。有觉悟的村民在闲聊时不止一次谈及此事,配合在城里生活过的子女们的节水意识的传播,老人们节约用水的习惯也已逐年养成。

乡村最有见识的人主要是常年在城市打工的群体,他们长期的城市生活体验中包含着反思与学习的成分。克服小农意识,发挥好这些人对乡村改造的合理意见,经由公共事务推动乡村建设,理应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思路。打工村民的意见中潜在地包含着诸多乡村共识。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进城务工者,他们对城市的判断趋于一致,这无形中获得了将城市合理地带入乡村的乡建思路中,容易获得来自不同家户成员代表的支持。家族共同体与村落公共性之间通过达成共识的公益事业开展合作,达成村民互惠、村落共荣的局面,Z村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探索。

(四)公共意识觉醒

村民逐渐认识到,要想实现常态的在家生活,必须兼顾考虑他者,“大家好才是真正的好”这一集合意识逐渐获得村民的广泛认同。增进乡村福祉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对此村民们已经得到适当的储备。经济积累与支出的意义不再只是封闭在家庭内部满足生存和发展,而是与村落社会自身变迁中的诉求保持着一定开放性与互通。正如西方学者对加拿大乡村现代化的洞察,共同体精神有一种劳动和物质的成分,即有一个获得经费、物力和熟练的人力来实实在在地建设共同体的过程。^[14]第一代农民工如何安放晚年的集体焦虑与眷恋故土的家园情结结合到一起,以及在家老人们希望获得更多参与“新变化”的体验与“乡土”情结,固守的小农偏见——保守、落后、狭私——理应有一个新的思考维度。以家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本身深受时代变迁影响,超越小农狭私的认识来评估家、家乡、家园,这是一种自我关怀和自我拯救意识的觉醒。小农经济在以家为依托的自我发展和自我保护中生成,这一逻辑在家户环境与乡村发生改变之时积极

做出回应同样会有所呈现。

当理念一致,经济上的储备得到适度保障,接下来需要的是如何组织好这些经济要素促成一致性理念朝实践层面转化。如今中国乡村普遍性衰落,不乏有些空心化村落举家、整村朝城市迁移,这一现象并非是乡村共同体理念的溃败,也不完全是缺乏足够的财力,而是缺乏足够的社会动员。寻求获得一致性认同的村落发展事务,嵌入共同体精神与社会性的组织行为原则,是乡村建设的一个突破口。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如今人们之间不可能进行社会整合,而可能发生的只能是社会的“联结”。如此“联结”是在社会生活中临时结合起来的的关系。“联结”得以可能并非彼此有着共同利益、共同信仰,而只是一己之力无法实现各自私利的他人假借。从而现代社会组织行为中的人彼此没有社会性的“普遍性”,只有获取各自私利临时的权宜性——“被污染了的普遍性”。^[15]这意味着,人们之间不可能因为共同利益或者共同的信仰而构成切实的社会关系。这就是,当人们面对着一一定的社会问题的时候,人们暂时结合在一起,并通过这种结合而共同对付社会问题。^[16]Z村的亮灯工程是现代组织行为弊端的反面样本,它的积极价值在于还原了组织的本源意义——组织的价值不该只是集众人之力完成既定目标的一个方案,而在于组织本身及其前途都是一种新的共同生活结合体,共同的目标与良好的社会关系同时被生产出来。

(五)有效率的组织保证

“亮灯工程”是Z村新乡贤共同体集体亮相的标志性事件。新乡贤的代表有方诤慧、方怡山、方余来、胡兴伦、方绪胜等人。这些人的经济能力、行事风格、家乡情怀整体上获得村民高度承认,主导着村落社会公共性叙事。有老派乡绅色彩的人则以三哥为代表,包括方绪传、芮立发、方绪全等老人。经济贡献与对未来谋划的构想,主要由新乡贤共同体牵头完成,老派乡贤引领在家村民,协调、组织具体事务。二者分属不同空间,各司其责,通过乡村—城市、线上线下一几乎同步的互动中展开。

网络社交平台中共同体精神的培育和共识并非促成事件达成的实践场域,真正的实践依然在实体的乡村。这种促成同样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以及坚定的、有行动或者经济支持能力的拥护者。具体事务的领导者主要是由三哥担当。行动领袖不仅需要践行共同体精神的能力,而且需要具备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这一事件的开展尽管具有组织行为色彩,却并不属于严格意义的现代社会组织行动,关键是需要激活乡村治理可以动用的优先资源及合理分配,让人们参与其中被视为是一个愉悦的过程,而不至于是出自科层化组织强制。行动领袖本人也应该是该共同体、事务的认同者,而非契约理性的职业经理人身份。涉及现代化事务被引入乡村,还需要行动领袖具备在现代语境中交流和表达的能力,如会使用手机、互联网等通讯工具。拥有这些能力的行动领袖,不再只是一个村社长老,而且应具备一定的现代文化知识及学习能力。

Z村的“亮灯工程”是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范例,它告诉人们如何成功地实现乡村共同体的转型,既不悖于乡村传统精神,也不能破坏被认同的社会结构,更不能逆潮流地与现代性相抵。杜威在《公众及其问题》中写到,“民主一定要从家乡开始,而所谓的家乡就是互相邻近的这种公社(即社群)”。^[17]杜威所指的邻居是非血缘式、契约理性中生成的社会关系,其特点与城市社区更靠近。如果依然套用“民主一定要从家乡开始”,那么Z村“亮灯工程”等事件成功的启示意味着民主也可能内生于血缘与地缘高度叠加的村落社会内部。村落共同体和自主性结合成就了一个新时代乡村建设的“完美实践”。

“亮灯工程”、抚恤同村村民、重修祖堂,以上案例并没有动用政府资源,无需任何行政成本,它是完全基于地方性肯定与自主性发挥的过程。亮灯工程具有强烈的现代化印记,它并没有走向传统乡村文化的对立面。相反,正是依托于乡村文化带来的团结机制和身份认同,才让对现代化正当性诉求得以实现。以上案例增强了村民自身的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充分发挥地方性文化认同心理,在实践中将其转换成一种行动机制,这不论对基层治理还是乡村建设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以家为生活主轴,家乡为情感集合场域,建设家园为行动目标,这是促发乡村建设的内在机制。借助互联网等新的议事机制,通过线上互动、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推动从议事到实践的乡里救助与乡村建设,是否能够成为一种新的乡建模式?目前来看,不确定如此模式是否能够推广开来。至少,通过后续行动来看,它作为Z村的乡村治理与建设模式已经成熟。

六、新乡贤共同体形成

传统乡绅一般都有为官经历,是退出官场的士绅,他们的学识、身份以及资财都不是一般小农所能比肩的,他们在乡村的话语权、综合能力远远超过一般小农,其在阶层归属上也不再属于农民,对他们的身份认定并非难事。而且,传统村落社会中如此贤能者在同一时期不会批量出现。现代乡村呼唤不仅具有地方认同感、归属感的乡贤,而且还需要其具有参与村社治理、培育公共性的主动性及创造力,缓解传统性与现代性、公与私,以及贫富两级分化造成的乡村矛盾。将处于不和睦状态的群体、邻居、家庭和个人整合到同一公共事务中去,最大化激活村社民主意识、自主意识和公共意识,这对老派乡绅而言是一个挑战。因此,现代乡村并不需要养尊处优、只有话语权威没有实践参与的老派士绅,而需要身体力行的乡村贤能者。绅被打上了阶层烙印,而贤侧重于道德考量。从乡绅到乡贤的转变,意味着长老统治、在乡村内部培养阶层差别的社会机制已经消失。

生产特权阶层乡绅的社会制度随着新政权成立被废除,涉及到村落社会的公共事务,曾经由长老统治与乡绅权威发号施令、“一统天下”的政治基础与社会伦理都已消失,而普遍性的“乡村精英”“乡村能人”在后续社会一直在出现。

“乡贤”强调其对村落共同体的高度认同感及践行能力。不妨在此将新乡贤

界定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有资财、有知识、有道德、有情怀,能影响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并愿意为之做出贡献的贤能人士。^[18]新乡贤之“新”有三个方面:其一指与新时代社会相适应的特点;其二强调有别于等级制的长老统治、家族权威的社会属性;其三突出紧随时代对现代性合理要素的吸纳能力。按照长期的生活场所、生产方式不同,将新乡贤分为“在土新乡贤”与“离土新乡贤”。“在土”强调生活半径以家户所在地为中心、县域为边界的务工者、创业者,以及在职、退休返乡干部、教师、工人等。“离土”指常年外出务工、创业、拥有体制内身份,情感与身份认同上“离土不离乡”的乡村原居民。

新乡贤涉及到资财、道德、情感三个维度,其在村落社会中不再处于小众的垄断地位。资财、道德、情感除了经济因素外,其它二者属于质性话语,难以将其量化。新乡贤具有大众化、平民性色彩。就具体村落社会而言,新乡贤应该是一个群体而非个体,具有群体性、共同性、组织性、精神性色彩。

通过对Z村以上三起发端于新媒体的事件分析,发现该村已经形成了新乡贤共同体。如此群体成员构成主要有三方面力量汇聚。

其一,由资深农民工及新生代打工群体中的成功人士组成的新力量,成为新乡贤的主要人员构成。这些人具有强烈的家乡认同意识、具有长期都市生活经验且对都市文明具有较强的感悟及吸纳能力。由于长期在陌生人社会中“讨生活”,具有一定的组织行动能力和“做人的工作”的智慧。在都市社会中获得集经济、人格、社交能力于一身的新型卡利斯马型人格——作为一个群体——成为形塑村落社会的主导力量开始形成。他们的价值观、社会心态、感悟能力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意味着,属于村落内部公益事务的提议,只要获得这些人的大力支持,成功的可能性就会提升。

其二,老派乡绅中的开明人士,紧随时代,获得在土新乡贤形象。乡村在家者主要是老人和妇女,将处于劣势地位的劳动力资源整合到现代乡村建设和治理事务当中去,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应对这种困难,需要人格魅力与组织行动能力高度结合才可能实现——施令者也是行动者。促成具体行动达成目标,还要有意识最大化化解该行动潜在地危害团结、生成新矛盾的风险;不仅需要兼顾血缘差序议事原则,同时需要充分调动积极性、发挥村社共同体精神,让整个村落集体获益——老派乡绅俨然不具备放下身段参与具体行动的品格,也不具备必要时“忍辱负重”“被人猜疑”“玩私心”却依然会顾全大局。

新乡贤理应是传统乡绅优秀品格和现代民主精神的结合体。乡绅控制性权威需要让渡到乡民对其自觉认同,这需要乡绅调整自身,从长老权威中自我降格,在民主精神、平等主义中呈现自身。在良好的村社互动中获得与其他社区成员对等的日常生活身份,获得平民形象。新乡贤不再是一种道貌岸然的形象,需要经常性参与社区交流和日常生活实践,包括顺其自然地参与有底线的地方性文化、娱乐、游戏活动。比如,Z村的三哥在乡村的日常生活中,包括讲荤段子、家庭聚会、民俗色彩的戏灯、以及民间宗教发起的庙会,他都是应时应景的参与

者。这无疑拉近了村民对其的认同感。

其三,经济能力有限但是道德、情感上具有新乡贤气质的村民也是新乡贤的来源之一。新乡贤形成的机制是一种流动的社会结构,会给“后起之秀”跻身于乡贤行列提供承认与携助空间。村落社会中有一种人,他们既非传统乡绅——不具备跻身士绅阶层的政治能力,也非现代乡贤——不具备相对殷实的经济基础;这种人属于村落里的开明人士。Z村的开明人士在1980年代就比较活跃,他们是乡贤追随者,容易理解乡贤的行动意图,且是中坚的行动力量。这些人在乡村治理、自主性实践中起到了先锋作用。他们对公益事业往往是不拘小节、积极拥护的姿态。如今村落里的开明人士主要对应着资深进城务工者中经济能力尚弱的人,以及90后进城务工者中的翘楚。

七、结 语

在资本主导的新媒体技术语境中,新媒体对社会的再组织作用是近乎“无心插柳”获得的功能。在乡村基层政权应有的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的状况下,新媒体起到了再组织村落社会的功能,并且在公益事业推动中已见成效。以新媒体为介,改观着传统面对面的议事模式以及乡村空心化导致的议事涣散,意外地培育起新乡贤共同体意识,促成新媒体与共同体精神结合,呈现出新意的乡村建设推动模式。新乡贤共同体一旦形成,村落社会开始出现新的权力结构。传统性的族权—长老统治—乡绅—父权层级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先前的族权及长老统治等逐渐式微,年龄、辈分不再是权威依据,个人化的乡贤逐渐由新乡贤群体取代。新乡贤群体主要朝谋生能力、文化水平、眼界及见识归拢,熟知乡村礼数且善于社交,耿直、公正的群体形象浮出水面。跳出门户之见、家族藩篱,身体力行地为村落公共性谋福利,是对新乡贤的期待也是其内在自觉担负。充分发挥民主精神,注重财力、能力与品行兼顾,推贤与主动担当并举,越发成为村落社会事务中活跃的力量。由此村落社会内部的权力结构逐渐呈现出民主化、平等化、集体化特点。唯家族化、长老化、父权化的等级权力制逐渐走向历史。在此意义上,乡村建设迎来一个有利的时机:只要充分尊重并激活新乡贤共同体力量,乡建可能就会有所突破。尤其是政府主导的乡村建设应该注重这一点。获得了他们的支持,意味着获得了最广泛的乡村民意及行动参与——将乡建主体还给乡村的主人。

强烈的建设家园意识不仅只是良愿,在Z村正逐渐转化成一种村民自觉的行动实践。知识型的“共同体”容易给人僵化、抽象、古老的错觉,其得以可能的世界图式,一定对应着梁漱溟所谓“事事相续”的生活实践。这一现象,引用一位学者的宏观阐释,也许是这样的:无论是日常的社会生活,还是危机到来时的社会变革,中国社会的结构都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某个个体或某一批个体的人格,他们非凡的品质决定了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这一影响,不但存在于乡村地方社会,而且渗透到中国的每一社会阶层。^[19]以对Z村的时代际遇观察,乡村

建设可能产生实际效用并且被村民承认的资源,依然主要仰仗于村落集体人格对行动的主导,在情感上根深于乡民历史性的家园情怀。与冒进城市化、资本主义入侵导致的乡村破坏抗争,还是村社意志顺应社会结构调整做出必要的妥协抑或与时俱进,将乡村城镇化抑或农民进城?未来处于不确定之中。Z村自觉建设家园的集体行动目前依然处在初级阶段,如此探索多大程度上将会转化为一种乡村惯习,能够早日实现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安心生活的愿望,依然有着不确定的未来。至少,如此行动的积极意义在于:有意识的自主性行动中酝酿着希望与新的可能性。

注释:

[1]李国庆:《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论战——以“戒能—平野论战”为核心》,《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9页。

[3][英]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页。

[4][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6—40页。

[5]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

[6]吴重庆:《无主体熟人社会及社会重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7][日]富勇建一:《社会学原理》,东京:岩波书点,1986年,第322页。

[8]有关“国家与社会”“制度与生活”两种理论范式的比较可参见肖璞:《“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视角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另见李友梅、黄晓春等:《从弥散到秩序:“制度与生活”视野下的中国社会变迁(1921—2011)》,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导论。

[9]阎海军:《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9页。

[10]应星:《农户、集体与国家——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六十年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64—70页。

[11]赵旭东、朱天谱:《反思发展主义:基于中国城乡结构转型的分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12]“戏灯”是当地用语,是皖西南一带乡村在春节期间举行的一种伴耍狮子、花灯、唱黄梅戏于一体的民间娱乐活动。“戏灯”一般以自然村落为单位在家家户户进行,不同家户会赏以数额不等的彩头。

[13]相关报道参见搜狐网,http://www.sohu.com/a/145420192_181521,2017年6月2日。

[14][加]黛安娜·布莱登等主编:《反思共同体:多学科视角和全球语境》,严海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9页。

[15]Laclau & Mouffe:《文化霸权和社会主义的策略》,陈璋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3年。

[16]Jean Baudrillard, 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y or, the End of the Social and Other Essays, p.7.

[17]Dewey, J.,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7, p.38.

[18]胡鹏辉、高继波:《新乡贤:内涵、作用与偏误规避》,《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19]张江华:《卡利苏马、公共性与中国社会:有关差序格局的再思考》,《社会》2010年第5期。

[责任编辑:刘姝媛]